

周玉良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教育史

主编 李东福 宋玉岫 杨进发

山西教育史

主编 李东福 宋玉岫 杨进发(执行)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教育史 / 李东福, 宋玉岫, 杨进发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03-06780-1

I. ①山… II. ①李… ②宋… ③杨… III. ①教育史—山西省 IV. ①G5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7439 号

山西教育史

主 编: 李东福 宋玉岫 杨进发

责任编辑: 冯灵芝

装帧设计: 黄 悦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4.5

字 数: 98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册

版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780-1

定 价: 1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邹时炎	杨海波	徐锡安	陶西平
顾问	王日新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黄定元	阎国华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 主 编	汤世雄	宋恩荣			
编 委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饮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关忠
	赵宝琪	俞启定	姜树卿	高 志	徐毅鹏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山西教育史》编委会

主 编 李东福

宋玉岫

杨进发(执行)

副 主 编 张静娴(常务)

安生川

刘文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占钧 王小鸽 王林义

牛 杰 刘文华 安生川

师建龙 宋玉岫 李东福

苏仰光 吴丽萍 杨进发

张子荣 张静娴 阎孟祥

谢步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子课题 山西教育史研究

课题组顾问 宋玉岫 曹福成

课题组组长 杨进发

课题组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占钧 王小鸽 王卯根 王林义

牛杰 刘文华 安生川 师建龙

苏仰光 吴丽萍 孟旭 杨冬生

杨进发 杨岸青 张子荣 张理明

张静娴 郝喜明 郭晚胜 阎孟祥

谢步成

总 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

2 山西教育史

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应该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位、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

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000 年至前 2000 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

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 toward 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些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

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的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

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厚的胸襟,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

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概 述

远古时期,山西气候湿润,地理结构独特,适宜古人类生存,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最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山西,有较系统的考古发掘、丰富的远古传说,它们记载了山西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山西远古时期的教育。

“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同于动物界之处,在于它的社会性、目的性,它不是靠自发的动物本能,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①自从有了人,人就要进行关于知识积累、经验传授、技能培养、社会道德教育等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活动最初是自发进行的,随着人类的进步,逐渐走向自为,乃至出现各类学校。山西考古发掘的各种资料所反映的远古教育,正说明了这样的一个进程。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掘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距今约 150 万年。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石器工具。这些工具看似非常简单,但以当时人类的条件,制造它们并非易事,其中必有经验传授及制作训练。山西襄汾县境内丁村遗址的石器较西侯度遗址中的石器有了较大的进步。沁水县境内下川遗址中的石器有了更大的进步,而且还有各种骨器、弓箭、标枪。这些工具和武器的制作和使用,必然蕴涵着更加丰富的经验传授和使用的训练,也更反映了人类的教育活动。

西侯度遗址中已有火的使用痕迹。丁村遗址、下川遗址规模

^①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 1 卷,4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2 山西教育史

宏大,形成了分布几十处的遗址群。这与氏族外婚制相符,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进步。自然,这种进步也离不开教育。这种教育比经验传授与技能训练,应该说形式更高级了。

山西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遗物,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的演变、礼乐文化的产生,以及原始社会人类亲属关系的形成、所有制的变化、宗族观念乃至民族观念的形成等等意识形态的日趋复杂化。毫无疑问,这些变化伴随着教育一同进行,而且依赖教育。

太行山与古传说关系密切,关于女娲、神农氏的传说都与太行山有联系。太行山古称女娲山、皇母山,在山西境内。在山西,还有许多关于女娲传说的遗迹,如吉县柿子滩、晋城浮山、平定浮化山、赵城侯村等地,有女娲的补天窟、娲皇陵等。关于神农尝百谷教人农耕的地方,虽有数说,但应以山西境内最为可信。山西有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相连,世传神农尝百谷于此,后人因此立庙祀焉。这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尧舜禹在山西的传说更为具体。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尧对教育的贡献很大。他定 360 日为一年,一年分四季,从而制定历法,使民劳作耕稼有所依循。他推行德教,举群言堂,禅让于舜。后人对他的德行有极高评价。舜都蒲坂即今永济市。舜对教育的贡献是,承袭尧的仁政德教,同时对内部进行以仁政德教为中心的秩序化整顿,如举八恺管理土地,八元掌管教化,契管人民,伯夷主祭祀等。舜帝“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其教育内容达到了德教的层次。而且,舜帝时似乎已有专人管理教育。这无疑为以后学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禹都安邑即今之山西夏县附近。禹亦是上古“贤王”,对当时的贡献除治水外,主要是仁德教化。

从伏羲女娲经炎黄到尧舜禹的这些历史传说中可以悟到,教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尧舜禹前,教育主要是教人如何利用

自然,如何谋生,而到了尧舜禹,有了德治教育,人类在创建着一种富有特点的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开始。

汉字的产生与山西也有密切关系。传说仓颉造字的场所在今临汾,清代临汾南关外西赵村有“仓颉古宅”。文字的产生对人类知识的积累、表达及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当人类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专门的教育必然应运而生。

二

山西是夏、商中心区域的一部分。夏代,山西教育沿着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趋势继续发展,文明化教育突出,其主要表现是:道德教育由原来注重“天下为公”逐步向上尊下卑的方向发展;文明教育向形成系统的“礼”的方向发展;乐的普及与成熟;孝亲等人伦道德的发展等等。夏代军事斗争激烈,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重戎尚武”,夏正是凭着武装从晋南发展到豫南,进而服四夷、布九州而为天下主。夏代已经产生学校,学校有“序”、“校”等名称。“序”主要从事军事教育,“校”主要从事伦常教育。

商代山西可以明显分为两部分:南部属商控制范围,属商代核心区域的一部分;中北部则由大大小小的方国控制,其与核心区域的关系错综复杂。商代各方面的发展都超越前代,教育也比夏代更规范,制度更完善。山西境内发掘的商代遗址有若干处,各处遗址中都有占卜的遗存,可见商代无事不占之说不虚。占卜蕴涵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教会远古人分析思考,对他们摆脱蒙昧状态有一定作用。占卜对文字的使用与发展也有意义。遗址中有祭祀的场所和器物,说明祭祀在当时十分重要。祭祀是神化教育的典型反映,具有强烈的神化教育意义。山西商代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商代文字。商代文字较夏代有明显发展,已与现代汉

字相近似。山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礼乐之器,墓葬的设置、殉葬及其摆设,都有一定方位,说明当时礼已相当繁复。出土文物又证明,商代学校教育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科目已见端倪,初具雏形。

西周与春秋时期,山西是晋国之境。西周已有较完备的教育制度,包括教育管理、学校制度、学习内容、教育与国家取士之间的关系等。作为西周的一部分,晋国的教育情况与西周总体教育情况近似。但山西又有其特点:其一,晋国治地从唐虞到夏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更注重德教;其二,晋国北方和周边有许多发展状况不同的文化,受其影响,晋国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重视法制教育。德治与法治的教化是当时晋国社会的两个方面。在道德教化中辅之以乐,在晋国取得了很大成就。晋国的乐师对乐理、乐律,以及乐对人的重要教育意义,均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与把握。《史记》中记述了晋国乐师师涓重谱“桑间濮上之音”的过程,反映了当时晋国人对乐的作用的高度认识,从中可见当时晋国文明化教育之一斑。《国语·晋语》中有一段栾共子对师与君臣之道的论述,把师的地位与父、君等同,反映了当时晋国人对师的认识高度,同样反映了晋国人对教育的认识高度。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山西是这场大变革的前沿地区。大变革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旧式教育的衰落,教育向民间扩展,即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所谓旧式教育,是指西周时期的官府垄断知识和教育的状况。春秋时期,“天子失官”,国家混乱,是官学下移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于生活和生产劳动之中;旧式教育中的平民教育被官府掌控,教育内容与西周官府需要相结合,不能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大比兴贤”之制已衰。这些是官学下移、旧式教育衰落、新学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兴起的根本原因。晋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影响,新文化和